

博物学经典译丛
NH 薛晓源 主编

喜马拉雅山珍稀鸟类图鉴

〔英〕约翰·古尔德◎绘著

童孝华◎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博物学经典译丛 薛晓源◎主编

喜马拉雅山珍稀鸟类图鉴

【英】 约翰·古尔德 绘著

童孝华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喜马拉雅山珍稀鸟类图鉴 / (英) 古尔德绘著; 童孝华译.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6.2

(博物学经典译丛)

ISBN 978-7-200-11519-2

I. ①喜… II. ①古… ②童… III. ①喜马拉雅山脉—鸟类—图集 IV. ①Q959.708-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92536 号

喜马拉雅山珍稀鸟类图鉴

XIMALAYASHAN ZHENXI NIAOLEI TUJIAN

(英) 古尔德 绘著

童孝华 译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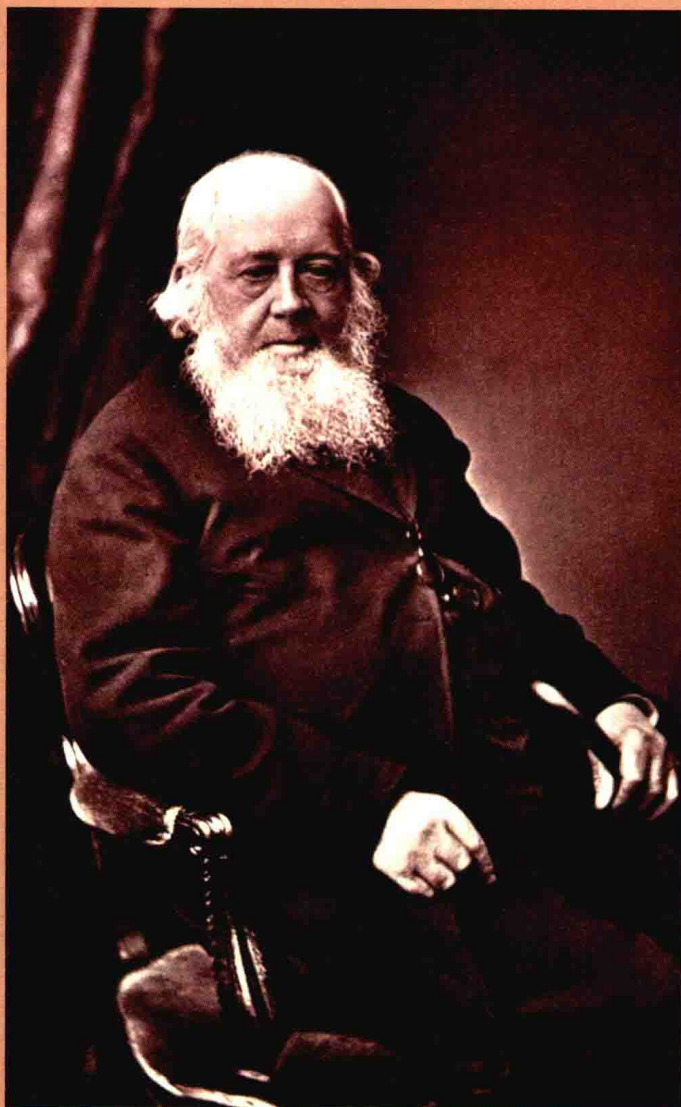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2 印张 105 千字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0-11519-2

定价: 68.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John Gould

约翰·古尔德 (John Gould, 1804-1881)

英国鸟类学家，鸟类画家。由夫人伊丽莎白·古尔德协助绘画制版，他先后完成了多部鸟类学专著，如《喜马拉雅山珍稀鸟类图鉴》《澳大利亚的鸟类》等。后者将其推上“澳大利亚鸟类学研究之父”的地位，而该国的环境组织也为纪念他被命名为“古尔德联合会”。从某种程度上说，达尔文自然选择进化论的成立有赖于古尔德的贡献，现今的“达尔文地雀”的谱系确定便是依据古尔德的分类研究。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也曾引用过古尔德先生的专著。

古尔德出生于多塞特郡的一个园丁家庭，父子两代并未受过很多教育。1818年到1824年，他在父亲工作的温莎皇家花园做学徒，之后成为约克郡雷普利城堡的园丁。在动物标本剥制方面，古尔德技艺精湛。1824年，他于伦敦开设了自己的动物剥制作坊，这项技能也助其后来成为伦敦动物学会首任会长和管理员。

鉴于本职工作特点，古尔德有幸接触到英国最顶尖的博物学家，并亲眼目睹捐献到动物学学会的鸟类标本。1830年，一大批喜马拉雅地区的标本来到英国，趁此机会，古尔德出版了专著《喜马拉雅山珍稀鸟类图鉴》。本书由威格斯撰文，古尔德夫人手绘配图，又经其他艺术家制版。

此后的七年中，他相继出版了四部作品，其中包括五卷本的《欧洲之鸟》。该书由古尔德亲自撰文，助理普林斯编辑。因当时的画师爱德华·里尔经济困难将其整套绘本出售，古尔德得以购买这些鸟类的图样放在书中出版，虽然成本颇高，他仍因此赚了许多钱。1838年，古尔德带夫人为其新作前往澳大利亚。遗憾的是，在三年后返回英国时，古尔德夫人去世了。

1837年，古尔德曾与达尔文相会，后者为其展示了哺乳动物和鸟类标本，由古尔德为其中的鸟类进行认定。几日后，古尔德放下手中生意，鉴别出达尔文先前认为的来自加拉帕戈斯的黑鹂属于一种全新的独立鸟属，包含12种。相继而来的是二人的多次合作。在达尔文后来编辑的《贝格尔号之旅的动物学》第三部分中，便加入了古尔德的鸟类学研究。

英国的格拉斯哥大学曾将古尔德誉为奥杜邦之后最伟大的鸟类学家。他一生出版了关于英国和欧洲其他地方、亚洲以及新几内亚岛鸟类的书籍，另外还有一卷是有关澳大利亚哺乳动物的书籍。成熟期的古尔德已经有了美学意识，在画中描绘出鸟巢和幼鸟的样子，大大增添了其作品的审美元素。



为复兴博物学做有特色的努力

刘华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博物学（natural history）是一种古老的探索、理解、欣赏世界的进路（approach）。它包括对事物的记录、描述、绘画、分类、数据收集和整理以及由此形成的适合本地人生存的整套实用技艺。博物学在发展过程中也演化出一些高雅形式，历史上相当多的博物学著作以十分精美的形式呈现。

博物学是人类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博物学，西方有西方的博物学，中国古代也有值得骄傲的非常特别的博物学。比较一下李汝珍的《镜花缘》与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也能间接大致猜到中西博物学的差异，虽然两者本身都只是文学作品。

近代以来，人们很关心西方人的观念，因为他们的一系列观念（有好有坏）深深地影响、改变了世界。于是，就科学哲学与科学史这样的学科而言，对西方的科学、哲学等颇重视。其实，不限于这样狭窄的领域，从更大的范围看，甚至从文明的层次看，也大约如此。但西方的观念并非只有科学、哲学（也未必是最好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清理和反省，如今我们看到了西方的博物学，虽然它仍然是

西方的，但含义、特征并不同于以前在科学、哲学的名义下所见到的东西。我们戴着“眼镜”看世界，不是这副就是那副，不可能不戴。现在我们有意识戴上博物学这副眼镜，以博物的视角看各种现象。

西方博物学最突出的特征在于西方的 history 而非西方的 philosophy。有些人不理解，在 21 世纪的今天，科学哲学工作者为何那么关注“有点那个”的博物学？坦率点说，恰好因为博物学“肤浅”而不是“深刻”！显然，这不是说凡是 natural history 都肤浅，凡是 natural philosophy 都深刻，只是招牌给人表面的印象是这样的。不过，博物学的行事方式、知识特点也部分决定其成果的性质，natural history 得出的结果注定与 natural philosophy 得出的性质不同。前者以林奈、布丰、达尔文的工作为代表，后者以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的工作为代表。在外行看来，前者容易与琐碎、杂多经验、复杂性挂钩，后者容易与统一、理论定律、和谐性挂钩。其实，许多特征是共有的。比如，数理科学家眼中并非只有简单的物理定律和生命遗传密码，现实中照样要面对各种杂乱无章；植物分类学家眼中并非只有千奇百怪的花草树木，他们也同样洞悉了大自然的惊人秩序。我相信，所有真正的学者，不管是哪一类，在其探究过程中都能感受到大自然无与伦比的精致与和谐，而这是一种无法言传的美学体验。

形而上学的简明二分有一定道理：侧重经验事实、观察描述与实验的 history 为一方，注重第一原理、假说推演、概念思辨的 philosophy 为另一方。但是，这种清晰的二分法本身也有缺陷，割裂了 history 与 philosophy 的互相渗透，它本身是一种人为的抽象、化简。亚里士多德是全才，既研究物理学、形而上学又研究动物志；他的大弟子特奥弗拉斯特深入研究植物，还被誉为西方植物学之父。化

简，有收获，也是有代价的。二分法的两大类学问、探究事物的方式不应当完全对立起来，而是彼此适当竞争，在有的时候取长补短。不过，就长期以来人们过分在乎 philosophy 进路并产生了多方面影响而言，现在强调另一面，即 history 的一面，也是一种合理的诉求。

哲学史家安斯提（Peter R. Anstey）认为近代早期有两种类型的博物学，一种是传统式的，一种是培根式的。第一种人们容易理解，从古代到中世纪，到近代再到现在，一直有脉络，形象还在，但第二种经常被遗忘。安斯提说近代实验哲学的“第一版”就是培根的博物学方法（Baconian method of natural history），也可以说培根开创了获取知识的博物学新进路（novel approach to natural history）。培根理解的博物学，真正“博”了起来，包罗万象，这与他的实验哲学、归纳法、宏伟的知识复兴蓝图有关。在古代和培根的年代，history 的意思与现在不同，正如那时的 philosophy 与现在的理解不同一样。现在人们能够理解牛顿的主要著作为何带有 philosophy 字样，并且清楚那时 philosophy 与科学不分；其实，那时 history 与科学也不分。复数形式的 histories 显然更不是指时间，而是指对事物的各种探究及收集到的各种事实。本来这也是 history 的古义，到了培根那里，研究的对象进一步扩展到血液循环、气泵等更新的东西。正是培根的这种博物学方法塑造了早期英格兰皇家学会的研究旨趣。波义耳也写过 *The History of the Air* 这样的作品，其中的 history 与现在讲的“历史”不是一回事；如今霍金出版畅销书 *A Brief History of Time*，难道其中的 history 只作“历史”解释？当然，我无意于计较词语的翻译，只要明白其中的含义，中文翻译成什么都无所谓，不过是一个代号。

我们今日看重并想复兴博物学，并非只着眼于它与数理科学的

对立，而是注意到其自身具有的特点，对其寄托了厚望。博物是自然科学的四大传统（博物、数理、控制实验与数值模拟）之一，并且是其中最古老的一个。如今的博物也未必一定要排斥数理、控制实验和数值模拟。如此这般论证博物的重要性固然可以，但还不够，还没有脱离科学主义的影子。说到底博物学不是科学范畴所能涵盖的，博物学不是自然科学的真子集。博物学中有相当多成分不属于科学，任凭怎么牵强附会、生拉硬扯也无法都还原为科学。在一些人看来，这是博物学的缺点，对此我们并不完全否认，但我们由此恰好看到了博物学的优点。成为科学，又怎么样？科学拯救不了这个世界，反而加大了世界毁灭的可能性。

博物学的最大优点在于其“自然性”。何谓自然性？指尊重自然，在自然状态下自然而然地研究事物。这里“自然状态”是相对于实验室环境而言的。“自然状态”下探究事物不同于当下主流自然科学的实验研究，它为普通公众参与博物探究敞开了大门，它同时也要求多重尺度地看世界，不能简单地把研究对象从背景中孤立出来。

“自然而然地研究”涉及研究的态度和伦理，探究事物不能过分依照人类中心论、统治阶级、男性的视角，不能过分干预大自然的演化进程。历史上的博物学是多样的，并不都满足现在我们的要求，有些也干过坏事。历史上有帝国型博物学和阿卡迪亚型博物学，还有其他一些分类。

不是所有的博物学都是我们欣赏的、要复兴的，但是的确有些博物学是我们欣赏的（或者说想建构的），希望它延续或者复兴，对此我们深信不疑。那么，究竟哪些东西值得复兴？其实现在研究得还很初步，无法给出简明的概括。一开始，不妨思想解放一点，多了解一些西方博物学。大家一起瞧瞧它们有什么特点，哪些是好

的哪些是坏的，哪些对于我们有启发。中国出版界长期以来不成体系不自觉地引进了一批博物学著作，现在看还可以做得更主动一点、更好一些。

许多西方博物学家在我们看来有着天真的“傻劲儿”，一生专注于自己所喜欢的花草鸟兽，不惜为此耗尽精力和钱财。我们并不想鼓动所有人都这般生活，但想提醒部分年轻人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可以选择不同的人生道路和生活方式。西方博物学无疑展现了多样性，可以丰富我们的认知、审美和生活。

博物画与博物学一同发展、繁荣，想想勒杜泰、梅里安、奥杜邦的绘画作品与博物学描述如何深度结合、难解难分就会同意，描绘大自然的画作与描写大自然的文字服务于同样的目的。用现在的“建构论”而非老套的“实在论”哲学来理解，它们在认真地描写对象的同时也在认真地建构对象。世人正是透过文字与画作这样的媒介来间接了解外部世界的。西方人眼中的自然是什么，中国人眼中的自然是什么？博物写作与博物绘画在此都起重要作用。当我们能够欣赏西方博物画时，反过来也有助于重新认识我们自己的美术史和文化史。中国古代绘画种类繁多，与博物学最接近的大概是花鸟画与本草插图，但在掌握着话语权的文人看来，个别者除外，它们大多被归类于“匠人画”或“院画”，境界不如“文人画”。于是，赵佶的《芙蓉锦鸡图》、谢楚芳的《乾坤生意图》和蒋廷锡的《塞外花卉六十六种》这类作品，在艺术评论家看来，可能并不很高明。民间器物上的大量博物画可能更无法入艺术史家的法眼。不过，价值观一变，这些都是可以改变的。以博物学的眼光重新看世界，不但能发现身边的鸟虫和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大自然，还可能看到不一样的历史与文化。

多译介一些博物学著作，也有利于恢复博物学教育。2013年我为一个植物摄影展写了一段话，抄录在此：“博物学是一门早已逃脱了当下课程表的古老学问，因为按流行的标准它没有用。但是，以博物的眼光观察、理解世界，人生会更丰富、更轻松。博物学家在各处都看到了如我们一样的生命：人与草木同属于一个共同体，人不比其中任何一种植物更卑贱或更高贵；我们可以像怜爱美人一般，欣赏它们、珍惜它们。”

西方博物学不止一种类型，每一类中经典著作都不少。特奥弗拉斯特、老普林尼、格斯纳、林奈、布丰、拉马克、海克尔等人的最重要著作无一有中译本。翻译引进的道路一定非常漫长，做得太快也容易出问题。出版经典博物学著作也不是一家两家出版社能够包揽的，但各尽所能发挥特长，每家做出点特色，是可以期待的。

薛晓源先生近些年十分看好博物学，广泛收集西方博物学经典，交谈中我们有许多共同的认识。晓源同时通晓哲学、艺术和出版，我相信晓源主编的博物学经典译丛有着鲜明的特色，在新时期必将实质性地推动中国的文化建设。

2015年6月21日于北京大学

发现新世界

——“博物学经典译丛”的缘起与目标



薛晓源(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自文艺复兴以降,西方开启发现世界的旅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绕好望角航行,发现非洲,欧洲探险家还远涉埃及、印度和中国。英国航海家库克船长在全球航行,寻找奇珍异宝;英国科学家达尔文登临“小猎犬号巡洋舰”奔赴异域,考察万物,促进了《物种起源》巨著的诞生;德国教育家洪堡在美洲探险,开启了生物的地理学考察;数以万计的探险家、科学家、诗人、博物学家、画家奔赴世界各地寻财问宝,留下了数以千万计的手稿、图片和文献,有游记、日记、考察报告、探险记,有精心手绘的地图、天文图像、动物植物各种图像,他们开启了西方博物学三百年的历史大幕。这三百多年气势恢宏,蔚为大观,产生无数重量级的艺术家、博物学家、文学家、科学家,促成许多文学流派、艺术流派和博物学派的诞生,大师林立、影响深远。

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澳大利亚自然历史博物馆就珍藏数以千万计的手稿、标本、绘画和珍稀图书。随着这些博物馆近年研究成果的刊布,随着拍卖市场的勃兴,数字技术蓬勃发展,使隐蔽在全球博物馆和个人收藏的大量珍稀图书、图片、文献浮出海平面,进入大众审美视野之中,这些曾经流连在宫廷王

室、达官显贵家中的奇珍异宝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叹为观止：这些图片色彩斑斓、纤毫毕现、奇苑仙葩、栩栩如生。这些图片所描绘的动物植物在全球化、工业化的今天很多已经绝迹，还有很多物种处于濒临灭绝的境地。对于这些文化资源的梳理、翻译和研究，对于我们提倡生态文明的今天无疑有伟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这些东西对于科学、地理学、考古学、探险、旅游学、博物学、绘画学、美学无疑有着至高无上的借鉴价值。我们今天出版这些图文并茂的书籍有如斯高远的志向和目标：

展现自然的历史风貌

呈现万物的生态原样

复现科学的探索进程

再现美学的自然启蒙

本译丛将根据不同的知识维度，根据不同学科和著作的影响力度，参考广大读者的热情和关注度，由易而难，循序渐进，每年计划推出 10 种左右，希望用 10 年时间出版 100 种博物学的译作，以期能够展示西方博物学三百年来大致轮廓和发展轨迹，以飨广大读者对于博物学的殷殷之望。北京出版社欣闻我在关注和收藏西方博物学名著，力邀我分门别类、编译出版，并为此付出大量人力和物力，令人赞赏；广大译者踊跃参与，有很多著名学者牺牲了宝贵的节假日，焚膏继晷，夜以继日进行校译，那份对博物学深爱的拳拳之情，令人感佩；北大哲学系刘华杰教授，百忙之中拨冗写序推荐，令人感动；在第一辑即将付梓之际，谨致谢忱如尔！是为序。

译者序

梳览历史，人类最早对于鸟类的兴趣或可追溯到史前，而我国在《尔雅》《尚书》这样的古籍中便有对此领域的记述。大航海时代以后，发达的海上强国通过政治优势深入全球殖民，寻找各地奇珍异宝，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鸟类学的发展。十八世纪中期至十九世纪后期，鸟类学走向繁荣。考察者们以新种的分类和描述为宗旨，走向鸟类充沛的地区收集了大批标本带回祖国。本书中一再提到的塞克斯上校和肖尔先生即在此列。

作为十九世纪英国声名远扬的鸟类学家，作者古尔德先生不遗余力地收集素材，潜心研究，在1831年出版了此书《喜马拉雅山珍稀鸟类图鉴》，并达到了相当专业的水平。喜马拉雅，梵语意为“雪域”，即雪的故乡，是中国和印度、尼泊尔等国的天然国界。由于海拔很高，植被纵分为四带，致使这里的鸟类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而追溯物种的发源也成为研究者们甚为着迷的意向。

本书从鸟类学出发，以喜马拉雅山脉为研究范围，记录了100种二百年前被先后捕获到英国和欧洲大陆的鸟类，从其分布、习性和外形逐一做出介绍，图文并茂，乃实时鸟类学研究中屈指可数的经典之作。古尔德先生在选材时有意识地从隼、山椒、松鸦、虹雉、鸨等各科中挑出最具喜马拉雅特色的品种，丰富了英国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知识，也为世界鸟类学研究做出了珍贵的补充。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为对开插画册本。所有插画由古尔德夫人手绘制版，笔触精细、色彩缤纷，各种鸟类姿态万千、惟妙惟肖，俨然是大自然的一面镜子，其艺术价值受到高度重视，为数不少的



读者被之中画作吸引而竞相购买收藏。笔者在翻译过程中不断为其版画赞叹：一本科学类著作能够注入等值的美学元素，使冰冷的文字与标本更加鲜活地进入读者的感性空间，实属佳作。

作为里程碑似的鸟类学专家，古尔德先生的这部作品为从事此专业人士以及爱好者们提供了庞大史料，例如书中许多鸟的拉丁语名称如今都已更改，加上交通与交流的环境局限，有些记述是片段的，甚至推测的，这就成全了读者重温历史的过程，使我们身临其境。因此，此书不单是一部博物志，亦是一部文明交流史。之后，古尔德先生还相继出版了多部其他鸟类学著作，最负盛名的便是他的七卷本《澳大利亚鸟类》。这些书籍现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陈列在各国图书馆中。



此外，本书的问世必将产生积极的教育影响。21 世纪以来，教育界出现了不少新动向，其中喜闻乐见的一点便是我国一些著名高校重新开设了博物学课程。这门古老的学科引起了人类对当前面临的环境及生态问题的思索，昭示象牙塔中“五谷不分”的学习者们追踪觅影、归本回真。诚然，其目标并非培养出大批的博物学家，而是引导后来人走向自然，体会造物之神奇，理解多元之伟大。笔者相信，自然志的复兴必将为科学至上的时代注入可贵的人文精神。

童孝华

2015 年 6 月